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雅典政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雅典政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日知 田野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政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449-1

I. 雅… II. ①亚…②日…③力… III. 奴隶制度—历史—
雅典 IV. 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70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雅 典 政 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日知 力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449 - 1

2009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

定价: 10.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延续。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中译本序

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来历、版本以及其他有关的考证,英译者拉克汉在他的《序言》里已经有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只就《雅典政制》这类研究对于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中见解的形成的的重要性和它在国家和法律的历史的研究上的价值,略申己见。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学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由对自然现象的探讨转向社会政治的研究。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片段观点之外,并没有、至少是没有遗留下来讨论这一论题的专门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略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两者在方法上有显然的差别。柏拉图用的是抽象的演绎方法:他所建立的是一种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比较的归纳方法;他的努力是针对着当时阶级,或者毋宁说是奴隶主阶级中的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一个如何使政权巩固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后来西欧的政治学家走柏拉图路子的固不乏人,但是大多数还是走的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所以,就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所接受的古希腊的“遗产”而言,毋宁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尤为重要。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英国流行的书如拉斯基的《政治典范》,



在美国大学里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如迦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等等，其内容和形式，也还可以追溯到《政治论》一书的影响——先泛论国家的性质，接着再讲政治制度。

然而，《政治论》的写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亚里士多德不但对作为当时希腊政治重心的雅典加以观察和分析，对当时阶级与阶级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予以密切的注意，他还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之后，便在他的学生们的协助之下，开始了这项规模空前的研究工作。约在公元前 328 和 325 年之内，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便已完成，本书便是其中的一个残篇。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对于形成现存的《政治论》这部书的内容，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尽管从《政治论》中也还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受的柏拉图的影响，但他后来终于放弃了那种抽象的探究，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方法，提出一些直接与实际政治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提出：“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这就与柏拉图的（至少是）《理想国》大不相同了。有人说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柏拉图的《法律篇》，这也只是说亚里士多德之着重实际的问题与《法律篇》的关系比与《理想国》的关系接近而已。至于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比较接近现实的概括，还是与他研究实际政制的工作分不开的。本书就是后来资产阶级名之为“比较政府”性质的研究中残存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亚里士多德形成其政治理论体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这一残篇的发现，也会增加我们对于



《政治论》一书，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治学方法的了解。

尤其重要的是，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一书中的中心主张是与本书有相似处。亚里士多德在前一书中主张使“中等阶级”（实质上是“中等阶层”，因为他所谈的都是奴隶主阶级内各阶层的问题）强大起来，以便像他所企望的，使富有的自由民和贫苦的自由民都不致各走极端；他把中等阶层当做一个平衡的力量。他虽然赞成民主制，但却是所谓“温和的民主制”。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梭伦很有好感，他认为梭伦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伦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而强化中等阶层——这和上面所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一书中的主张是一样的。他们的目的也相类似：通过防止大富极贫或实行防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求得当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巩固。目的一样，手段也相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受了梭伦的影响。而他对于梭伦施政的情况，恰好在本书中也有较详的叙述。因此，这一残篇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大帮助的。

此外，对于一般历史、国家与法律的历史，本书还有史料价值。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和国家与法律的历史的发展，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辩论家和执政人的演说、碑铭中的资料以外，比较有系统的著作，有色诺芬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以及另一个题名为《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等等。亚里士多



德的《政治论》和这本《雅典政制》都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用史料的著作。特别是本书，他引用了许多原始材料，如梭伦的诗篇、民间歌词和谚语等等；征引了希罗多德，也采用了修昔底德的著作。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出世后，关于希腊历史的材料续有发现，对雅典古史的研究也有新的发展，但本书终不失为有用的史料之一。

正因为它具有史料的价值，所以这部残篇对于我们研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也有参考价值。然而能不能像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假如恩格斯看到了这本《雅典政制》（按《雅典政制》原本公布于1891年，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恩格斯绝对没有看到过。），他就会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主要提法改变了呢？这就涉及了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参考价值问题。

我们可以首先肯定的是：倘使恩格斯看到了这本书，那么，本书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某些内容是可以有所补充的。比如，当恩格斯在该书提到梭伦的“革命”中“债务简单地被宣布为无效”的事件时，他自己也说：“不知其详情”，而在本书第五节到十二节中，就有对于这一史事的前因后果的较详叙述，并且还摘引了梭伦自己有关的诗篇。又如恩格斯在“雅典国家的发生”一段中，也表示对梭伦时代的历史“知道得很不完全”，而在以上所举本书各节中，却有对于梭伦执政及其政治经济改革的较详记载。凡此种种，都是可以作为有用的补充和参考材料的。

但是本书却并不包括足以改变或修正《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中论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论点和提法的材料。那个基本论点和提法就是：在雅典“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正因为雅典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和内部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在这里，“民主共和国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才说这是“一般国家形成的极为典型的例子”。但在本书中，对于雅典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时期，如对提秀斯的事迹则只剩了几个断片，非常简略；对梭伦比较详细，而且其内容正如上面所说只能充实恩格斯的论据，而不是什么足以改变他对古希腊国家起源的提法的问题。至于对克莱斯特纳斯的叙述就更不发生影响恩格斯基本论点和提法的问题了。可见资产阶级学者上述的荒谬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然而，从这里，我们却应该得出这样一条理论斗争的经验：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惯会夸大稀见的材料的用处并拿它来吓唬人。对此，我们就应该深入地钻研一下那些材料，以便指出他们的看法没有根据而进行彻底的驳斥。再则，研究经典著作，本来也就应该把其中涉及的学说和史实弄清楚，然后才能深入钻研下去，而求得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学习恩格斯论国家起源的著作，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莫尔根的那本《古代社会》的内容熟悉一下，同时，也应熟悉莫尔根书中的许多假说被推翻以后的新的材料和论点。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有既结实又深湛的理解。这本《雅典政制》，尽管是残本，却也能增加对恩格斯这一经典著



作中某些地方的理解。

这篇短序写成后曾寄给日知同志请他指正,承他于复信中见示研究古希腊史的近况,使我对原稿某些词句做了必要的修改,特此致谢。

吴恩裕

1962年9月



英译者序言

拉克汉

一 政制(The Politeiai)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①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利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库斯伦理学”，X. IX. 21, 23）提到了后一部书的绪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好坏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每一部无疑地都像我们手边这部那样，先包括所论究的那个国家的政制史，接着叙述这个国家在写作当时的政制情形。这些论著往往都被说成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但在编辑这些论著时，他可能得到门徒很多



^① “尼科马库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一，由其子尼科马库斯编成。——译者

的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①,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二 “雅典政制”抄本

但在 1880 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喻(F. G. 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②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 78 和 79 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账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 100 年左右。无疑地这是给一个私人(可能即四位书手之一)准备的,而且大概是它的所有者死后的殉葬品。

① 按即指公元 1880 年。——译者

② 罗马皇帝。——译者



三 版本

1891年,佛勒得里克·刻泥喻爵士公布了纸草的影本和附有序言和注释的原文的印本。1893年,珊底斯(Sandys)发表了一部经过修正的原文,且附以完善的注释。而刻泥喻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版本亦于1903年公布,纸草第四卷的断片,经他推断整理,成为连续的原文,也包括在这个版本之内;他的最后版本于1920年在牛津发表。在国外公布的几种版本中,最近的一种是1928年俄珀耳曼(Oppermann)根据布拉斯(Blass)和萨尔赫谟(Thalheim)的原来版本发表的透布涅耳(Teubner)版的原文。

四 原文

本版的原文以刻泥喻的初版本为根据,而依照后来学者对纸草的校读加以订正。某些评注和校订意见已经附录于此;至于文法上和数字上的错误,以及措辞有些不够文雅(例如 τὸνδε τρόπον,大多数编者均以 τὸνδε τὸν τρόπον 代之),到底其中有多少是出自书手的粗心大意,有多少应由作者自负其责,学者各异其说。论文首尾的若干节重要的缺文,曾经学者花费治学工夫,从随后希腊作家的引文中苦心搜求而得,这里已经把它分别添补在纸草原文的始末。

五 原料

本书历史部分的原料,在珊底斯版第 LIV. 页以下已加



以研究。著者有时引用梭伦的诗(XII.)、民间的诗歌(XIX., XX.)和谚语(XVI. 7, XXI. 2),作为自己的证据。有一次他提到了希罗多德(XIV.),关于珀西斯特刺图斯和克勒斯塞涅斯的事实(XIV. 37, XX.),他照希罗多德叙述,而略加变动。他没有提起修昔的底斯的名字,但是关于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同(XVIII.),关于四百人政府(XXIX., XXXIII.),他都追随修昔的底斯,而加以修改。随后部分他大概以厄福律斯(Ephorus)的作品为依据,但是有些说法可能采自克勒得弥斯、法诺得弥斯和安德洛提喻的“阿提卡史”(Ἀττικῆς of Cleidemus, Planodemus and Andro-tion)。

他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 XVIII. 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刺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①之出现于雅典(XXV. 3)。他引用官方文件(XXVI. 末, XXX., XXXI., XXXIX.);他推论现在以追述过去(III. 5, VIII. 1, XVI. 5, XXII. 3);并且引证他人使用这种方法(III. 3, VII. 4)。

六 写成的年代

“雅典政制”中所记的最后事件是在刻腓索丰(Cephisophon)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LIV. 7),亦即公元前329年。此

① 原文误作426年。——译者



书又说到三列桨战舰和四列桨战舰(XLVI.1),但是没有提起五列桨战舰;在雅典海军中有五列桨战舰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前325年。所以本文写成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28年和前325年之间。但是此书又说到雅典还在派遣官吏前往萨摩斯(LXII.2),而萨摩斯到了公元前322年,即亚里士多德逝世那一年的秋天,已经不复在雅典控制之下。



内 容 纲 要

第一编 公元前 403 年前雅典政制史

(一) 断片 1. 原始世袭的君主制^①。伊喻(Ion)时代军事指挥权由王者转给军事执政官。

断片 2. 王权在潘狄喻(Pandion)四子间作地区分划。

断片 3. 塞修斯(Theseus)之恢复统一。

断片 4. 塞修斯统治下平民权力之成长。

(二) 断片 5. 塞修斯时代的宪法：四个部落，三一区(Thirds)，胞族，氏族。

断片 6. 塞修斯之被杀。他的遗骨被雅典收回。

断片 7. 世袭的王政之告终。

断片 8. 库隆(Cylon)阴谋为墨加克勒斯(Megacles)所镇压。

抄本章 I. 雅典之污秽与净秽。

章 II. 因债务者之强迫劳役而起的内部纷乱。

章 III. 德拉科(Draco)以前的宪法。第三个执政官之设

^① 原文误作“专制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是不对的，这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所谓“君主”(以及下面所谓“王者”)，仅是军事首领(巴西勒斯)而已。——译者

